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李白鹤

摘要: 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逐渐形成关于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他们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倡导正体现出按照这一思路对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努力。40 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则明确揭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不但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关键词: 新民主主义文化;学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A81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0169(2019)05-0001-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9.05.001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P1516)} 马克思主义不但为中国的革命实践提供重要思想武器,也为中国的新文化建设提供重要指导。20 世纪 30 年代中后期,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们明确意识到“目前思想文化运动是以抗敌救亡、民族解放为依归,……以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2](P224-225)}。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的思路是他们此时探索中国文化问题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对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倡导正是反映了他们按照这一思路对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努力。要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文化?20 世纪 40 年代初,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回答,指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正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同时也对文化的概念、文化的作用、如何处理文化的古今中西关系等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中的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进一步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学术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1939 年,潘梓年、艾思奇、柳湜等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撰写文章号召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他们认为,“学术是文化的中枢”^[3],“对于学术具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才有建立文化的正确指针”^①,而此时关于学术的正确观念应是“学术中国化”。他们提出,要对古今中外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潘梓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2722019JCG00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长期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31510000054)

作者简介:李白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湖北 武汉 430073)

① 参见《学术动向特辑》,《时论分析》1939 年第 10 期。

的一切学术、思想、文化的精华加以吸收、消化和改造，用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帮助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种种问题，同时也建成中国自己的现代新学术新文化。1941年，上海《哲学》杂志第1卷第3期上的《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一文开篇就指出，如果说1939年中国文化界的基本口号是“学术中国化”，那么1940年的基本口号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这也表明，自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发展方向后，“新民主主义文化”迅速成为中国文化界关注的焦点。那么，当时马克思主义者们倡导的“学术中国化”与毛泽东、张闻天等提出并得到众多马克思主义者拥护和赞同的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中指出，这两个口号的工作方向不是矛盾的而是一致的。“学术要‘中国’化，这个中国指的是摆在我们眼前的此时此地的现实的中国，而这样的中国，就正是为了要争取整个新民主主义（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同样也包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着的中国。这样，学术中国化就走向了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二者构成了内在的必然联系。”^[4]在这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口号的提出被视为是对“学术中国化”这一口号的展开、补充和深化，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被视为此时学术中国化运动的现实目标。陈垦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一文中也专门谈及两者的关系，并且称两者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他指出，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革命任务，这样的社会现实“要求融化西洋的进步文化作为我们自己的血肉；扬弃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把它推进至较高阶段而以之充实世界文化的内容；于是文化界提出了‘学术中国化’的口号作为我们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形式，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我们所祈求的新文化的内容”^[5]。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民族和地区争取解放的革命文化，“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的、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表达革命文化的内容。他强调，中国的新文化应是在中国旧文化的废墟上建立起来，因此，“学术中国化”蕴含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文化中积累的精华发扬出来，同时把腐朽的残渣清除出去，并使世界进步文化因为获得了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而更加充实和优秀。同年，潘梓年在《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中也指出，在这一时期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文化运动的鲜明旗帜；“学术中国化”是文化工作者们进行文化活动的共同信念，“‘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名言，成为一切部门的文化工作者座右铭。文艺创作者热烈地讨论着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社会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历史，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着国防工业、交通运输、战时生产、医药卫生等等中的具体问题，哲学家在研究着中国的古代哲学与思想上抗战建国中的各种问题”^[6]。可以看到，在这些论述中，中国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学术中国化”是创造中国新文化的手段和方法，这种创造既包括对世界进步文化的消化，也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核心在于立足中国现实。

当时这些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的分析，实际上也揭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提出时的重要思想背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升级，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日渐高涨，中国文化建设要立足中国现实、中国文化应具有中华民族的特征等渐渐成为人们自觉的认识。同时，随着人们对“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分日益清晰，人们对文化的时代性也有了更深刻的体认。因此，这一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关注文化的民族性的同时，开始思考文化的民族性如何与时代性相适应的问题。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他们提出新文化建设“中国化”的主张，认为中华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既不应盲目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既要消化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尊重自己的历史、批判地接受民族优良的传统，应立足于中国现实，建立民族性与时代性兼具的中国现代新文化。在1937年底到1938年上半年延安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陆续刊登的《现阶段的文化工作》《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文

化运动要“充分中国化”的明确号召和对“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的专门强调^①。三十年代末，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学术中国化”的大力倡导正是反映了他们按照“中国化”的思路对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努力。他们指出，学术是文化的“首脑部分”^[3]、“最高部门”^[3]，“学术中国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他们强调，“中国化”是“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7]，“是对于中国文化全面活动有效的”^[7]，因而也应是当前中国学术活动的指导观念。在他们对“学术中国化”的倡导中，不但强调了吸收外来学术的精华和批判地继承中国优良传统并熔铸成中国化的学术对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意义，更在此基础上对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进行更深入的阐释和论证，具体阐明了外来文化的中国化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都是文化“中国化”的应有之义，深刻揭示了立足中国现实的“中国化”是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必然途径。

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正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三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关于新文化建设思想的深化和发展。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这个新文化究竟是怎样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提出对这一问题予以了明确，指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正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如何实现建立新文化这一目标？尽管陈垦等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称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实际上，在他们的解读中，两者更是“途径”、“方法”与“目标”的关系，学术、文化的“中国化”是建立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必然途径和方法，而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当时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建设目标。正如他们所指出那样，学术、文化的“中国化”强调学术、文化建设要切合中国现实，而当时的中国正是为了要争取整个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斗争着的中国，由此，学术、文化的“中国化”就走向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一目标。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重要问题的回答

陈垦等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的关系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1940年初毛泽东、张闻天等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宣扬。现今，学界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时，通常都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视为标志性的文献。1940年1月5日，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做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指出当前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任务就是建立为抗战建国服务的中华民族新文化。1月9日，毛泽东也在这次大会上做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演讲（后在《解放》杂志上登载时改名为《新民主主义论》），他明确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8]（P663）}。在这些文献中，他们以“五四”为界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前一阶段的领导阶级是资产阶级，要建立的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后一阶段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8]（P698）}。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文化革新的任务、新民主主义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如何处理和对待中西文化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论述，提出了揭示中国新文化的性质、特征、作用和建设途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这些思想，得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普遍

^① 参见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周刊1937年第1卷第23期，第12页。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战时生活》1938年第14期，第10页。

拥护和赞同，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宣扬和阐发中，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论争中许多重要问题的回答被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

（一）文化的概念

“文化”的概念存在着广狭义之分。在近代以来的文化论争中，一直也存在着论争各方在一些问题的分析上使用的“文化”概念范围不一致的情况。到了30年代中期以后，很多论者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在对文化问题展开探讨时，都注意对“文化”概念作出广义或狭义的限定。1938年，胡绳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就指出，柳湜的《国难和文化》和潘梓年的《论抗战期中的文化运动》两书对关于文化的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运动”——之所以有分歧，就是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文化概念分别是狭义和广义的文化。胡绳引用了柳湜在《国难与文化》中对文化与文化运动的解释：“平日我们所谓文化就是指某特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二，所以我们说文化斗争就是意识斗争，因为这一斗争是属于意识的范围”^[9]；胡绳认为，柳湜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就是狭义的“文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总和，“它是作为上层建筑而与经济，政治相对待的，也可以说他是作为精神的文化而与物质的文化相对待的”^[9]。胡绳也引用了潘梓年在《论抗战期中的文化运动》关于文化运动的解释：“文化运动是用自己的努力来促进自己对于一切生活做有意识有计划的有把握的经营。”^[9]胡绳认为，潘梓年在这里所说的“文化”也就是广义的“文化”，“总之，使人类与其它动物不同的一切都可以用‘文化’来表示的。因为其它动物只是适应自然，消极地，非意识地利用自然，而人类是变革自然，积极地，意识地利用自然，在现成的自然的条件上创造新的，从来所未有的事物。广义的文化是与自然对立的”^[9]。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文化广狭义的清晰区分，在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文献中有着明确的体现。《新民主主义论》在考察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伊始，就对“文化”概念作出限定：“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8]（P663）}，以“（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特别地强调这里论及的是狭义的“文化”。这一区分和限定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深入地探讨有关文化的问题提供了更为明确的理论依据。冯契在40年代的《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中就曾谈到，人们在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的某些错误观点源自对广狭义“文化”概念的误解。冯契指出，一种典型的错误就是从广义的“文化”出发来论证狭义的“文化”只有地域或民族之别。这种观点认为文化既然包括政治与经济，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应是文化决定政治、经济，并由此将中西文化的差异仅视为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差异，而忽视它们在时代性上的差异。在冯契看来，这里的广义“文化”概念实际上类似于“生活”概念，生活中包括政治与经济，因而在广义的文化里面仍然可以区分出为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的文化各部门。“人是社会的动物，而构成社会的基本的条件在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而哲学，科学和艺术等，却必须在一定的政治经济的条件下，才能产生。”^[10]他由此指出，文化必然有其时代性，因而那些片面强调中西文化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的差异而忽略文化的时代性的观点，比如中国本位论或全盘西化论，也就无法成立了。

（二）文化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曾把文化的改造视为解决中国社会所有问题包括政治、经济问题的基础。他们认为，首先要从文化思想上打破封建思想的枷锁，唤醒中国大众，才能获得救国救民的成功。新文化运动后期，在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们认识到，文化的革新对于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的确有着重要作用，但要改变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实却不能单靠文化运动，文化运动无法代替社会运动和政治革命。到了三十年代中后期，在新启蒙运动中，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能完成其任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没有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斗争相结合，没有在政治经济上获得坚实稳固的基础。他们强调，新启蒙运动作为文化上的救亡，其任务也就是要配合政治、经济上的要求，把民众从封建旧文化的桎梏中解放出

来。相较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早期的那种“将文化改造作为解决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本工具”的思想倾向，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文化的作用、对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入、更为切合当时中国现实的把握。随后，这些新的认识被吸收和进一步丰富，并明确地呈现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代表文献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国革命实际，对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文化的作用作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文化的革新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要破坏旧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张闻天也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是抗战建国的一种重要的斗争武器。……其目的，是要在文化上、思想意识上，动员全国人民为抗战建国而奋斗，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最后巩固新中国”^[11]。此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深刻认识到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因而他们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指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8](P663)}；并且同时又强调单靠文化运动无法真正改变中国半殖半封的社会现实，指出“只有取得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才能大大发展新文化，使新文化成为统治的文化”^[11]。

（三）新文化的特征

毛泽东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的提法来概括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①。他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8](P708-709)}。这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立足于中国现实实践对中国新文化的特点和建设任务作出的重要总结。

在他们对“民族的”这一特征的论述中，包含着“民族的”两方面的重要涵义：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此时中国最紧迫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是实现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因而新文化应当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有其自己的特点，这是文化的“民族的”这一特征另一方面涵义的核心内容。所谓“民族的”文化，它是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正确地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他是具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优良的传统，具有良好的地理，丰美的物产，具有能够成为全世界优秀民族之一的力量，他有他自己的特点，应当加以发挥；具有足以和其他优秀民族竞胜的力量，不应自斫自弃”^[12]，如果人人都有这种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自信，都能认识到自己应该而且能够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力量，这样就会形成拥有巨大力量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抗战建国的实践，这也正是“民族的”文化的凝聚力的重要体现。

作为科学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8](P706)}，是“把真理当做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和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11]。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由何而来？这源自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有着最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理论的指导。“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

^① 在张闻天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一文中除了谈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特征之外，还提到了“民主的”这一特征。在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宣扬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文献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特征”、“四特征”的提法都有使用。但之后更为流行的提法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种“三特征”说。论文在这里主要基于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文献的共同之处考察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对这些文献中的某些具体论述差别，考虑论文主题及篇幅，将另文考察，不在这里展开讨论。

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11]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清楚地认识中国旧文化的性质和基础，明确新文化的任务和方向，才能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结合中国历史和现实，在历史的辩证发展中找到文化的发展规律，才能以科学的方法来对待中西文化，才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科学的中国现代新文化。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代表人民大众利益、服务于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所拥有的文化。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建设新文化是为新政治、新经济的建立而服务的，因此中国的新文化必然是为民族和人民大众的解放而斗争的武器。另一方面，新文化要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就必须成为大众所拥有的文化。这里又包含着文化的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文化的普及，强调的是要使文化成为大众能够懂得和接受的文化，因此，文化的大众化在这一意义上又包含着通俗化的意思，即用通俗的形式使得新文化为大众所把握，但是，通俗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新文化能够成为大众用以为民族、民主、科学而斗争的武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的新文化的‘大众化’不但不是降低新文化的水准，而正是提高新文化的水准”^[11]，新文化不仅是普及的大众的文化，也是不断提高的大众的文化。作为大众的文化，它正是在普及中不断提高，在提高中不断普及。

（四）如何处理文化的古今中西关系

在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文献中，毛泽东、张闻天等不但指明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未来发展方向，而且阐明了如何对待古今中西文化、如何将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正确方针，实际上，这也正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新文化的探索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的总结。

他们指出，此时在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而这样的文化，对外是买办主义的，即投降妥协、缺乏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对内是封建主义的，提倡独断、盲从、反科学、反大众；因此必须彻底地扫除这种为帝国主义的压迫、封建主义的统治所服务的旧文化，“新文化是这种文化的彻底的否定”^[11]。但是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彻底地抛弃和否定中国一切原有文化；“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8](P708)}，对其中的积极进步的因素加以接收、改造和发展，融入到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和建设中，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真正地发扬光大。

他们还指出，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应当充分吸收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优秀的一部分。他们都批评了“全盘西化”的做法，指出毫无批判地全盘照搬会将许多糟粕输入中国。对于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他们还专门强调了要防止形式主义地吸收。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为例，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8](P708)}。在张闻天那里，他使用了“中国化”这一概念来强调对外国文化的优良成果的接收要结合中国实际，“外国文化的‘中国化’，……是使外国文化中一切优良的成果，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这不但能够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到更高的阶段，而且也将使它给世界文化以极大的贡献”^[11]。

三、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曾运用他们刚刚掌握的理论武器参与了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此时，他们主要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动。他们指出，中国原有文化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成为了社会进步的障碍，西洋近代文明也已经腐朽不堪。在他们看

来，西方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应当欢迎的文化。在论战中，陈独秀、瞿秋白、杨明斋等马克思主义者撰写了专门的文章和著述，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文化问题，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论力量。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了广泛影响，无论是在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30年代前半期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未直接参加的30年代中期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都显现出其强大的影响力。在3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和学术中国化运动中，许多参与者都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分析文化运动的具体实践方法、考察中国新文化的建设途径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对新哲学的阐释和运用应当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应当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结合起来。在学术中国化运动中，柳湜、嵇文甫、潘梓年等都曾专门论述来自马克思主义的“最进步的科学方法”对于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作用。他们强调，“精通唯物辩证法，精通马列主义”^[3]是学术中国化的基本条件，指出要“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法研究中国历史，中国问题，一切的问题”^[12]，详细论述要用唯物辩证法去分析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传统，要历史主义地评估、接受和发展这种优良传统，以建设服务于中国抗战建国现实的新文化。

从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历程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一直是他们思考新文化建设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随着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把握和理解的不断深入，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日益紧密结合的实践中，他们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新文化发展目标 and 方向、中国新文化建设途径等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40年代初，立足于当时中国的现实，他们进一步指出此时中国要建立的现代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新文化。对于“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在3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形成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的基础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在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标志性文献中总结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文化的古今中西关系、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等问题上的深刻认识，系统阐明了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世界进步的文化成果的正确原则，并由此确立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直至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方针：坚持立足当代又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立足本国又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

随着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提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阐明。毛泽东、张闻天在回顾中国探索新文化的历程的基础上指出，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长之日起，“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8](P697)}。他们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今天最能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奋斗的一种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学说。……它历来就站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先锋的与指导的作用。当它的影响愈是扩大时，则它为新文化的斗争，也愈是有力”^[11]。在他们看来，中国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成果，又是中国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主义和学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思考如何正确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世界进步的文化成果的同时，对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对西方进步文化成果决不能形式主义地吸收时，就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8](P707)}。

可以看到，正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展开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关于中国文化

发展道路的探索中，逐渐形成了现代新文化建设的“中国化”思路；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立足中国现实、总结中国革命实践和文化探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确立了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文化发展方向，并对近代以来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提供了重要指导。同时，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探索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他们对中西文化关系日益深刻的认识也启发着其更好地将来自西方的先进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和中国革命实践。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何干之. 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M]. 上海:生活书店,1937.
- [3] 潘梓年. 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J]. 理论与现实,1939,1(1).
- [4] 无邪. 一年来的中国哲学界[J]. 哲学,1941,1(3).
- [5] 陈垦.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与学术中国化[J]. 四十年代(上海),1940,1(1).
- [6] 潘梓年. 为抗战建国服务的新文化运动[J]. 群众,1940,4(18).
- [7] 柳湜. 论中国化[J]. 读书月报,1939,1(3).
- [8]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胡绳. 什么是文化[J]. 战时文化,1938,1(1).
- [10] 冯契. 中西文化的冲突与汇合[J]. 时与文,1947,1(2).
- [11] 张闻天. 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J]. 中国文化,1940,1(2).
- [12] 潘梓年. 目前文化工作的具体内容——高度发扬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J]. 翻译与评论,1939(4).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gramme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LI Bai-he

Abstract: In the late 1930s, Chinese Marxists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Sinicization of Cultur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With this view, Chinese Marxists advocated the Sinicization Movement of Academic Studies. And in the early 1940s, the Programme of New Democratic Culture pointed out that the modern new culture to be established in China at that time is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which is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popula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gramme is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larifying the position and role of Marx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hinese culture, demonstrating the necessity and importance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Key words: new democratic culture; sinicization movement of academic studie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责任编辑 孙洁)